

唐代笔记对国史の利用

严 杰

唐代笔记的材料来源,大体有二,一是作者的所见所闻,一是已有的文字材料。所见,为作者亲身经历与目睹。所闻,为得于他人谈论。文字材料,有各类著述,其中包含他人笔记,也包含唐代国史。关于唐代笔记利用本朝国史的情况,历来罕有论述。周勋初先生撰《唐代笔记小说的材料来源》一文^①,对此问题作出了深刻阐述。笔者读后受到启发,因作此文,冀以补充,或不免续貂之讥。

一、唐代笔记对国史的抄录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曰:“天宝已后,名公各著文章,儒者多有撰述,或记礼法之沿革,或裁国史之繁略,皆张部类,其徒实繁。”“裁国史之繁略”,当指对国史直接利用,从其撰述中可以发现国史的相关材料。在杂史、笔记中,也能找到对国史直接利用的文字。这样,以国史为参照,在唐杂史、笔记中产生两种写作方式,一是大量抄录国史的文字,一是补充国史之阙漏。

材料主要采取国史的笔记有刘肃《大唐新语》、胡璩《谭宾录》,这与《旧唐书》中有关文字比勘则显而易见,盖前人已判断《旧唐书》多沿用唐国史旧文^②。

《大唐新语》作于元和二年。自序云:“今起自国初,迄于大历,事关政教,言涉文词,道可师模,志将存古,勒成十三卷。”书末《总

论》又云:“《春秋》凭义以制法,垂文以行教,非徒皆以日系月编年叙事而已。……自微言既绝,异端斯起,庄、列以仁义为刍狗,申、韩以礼乐为痼疣,徒有著述之名,无裨政教之阙。圣人遗训几乎息矣。昔荀爽纪汉事可为鉴戒者,以为《汉语》。今之所记,庶嗣前修。不尚奇正之谋,重文德也;不褒纵横之书,贼狙诈也;刊浮靡之词,归正也;损术数之略,抑末也。”按《后汉书·荀爽传》曰:“集汉事成败可为鉴戒者,谓之《汉语》。”《大唐新语》虽仿《世说新语》体例而分门类,然其所重已不相同,从其名“匡赞”、“规谏”、“极谏”、“刚正”、“公直”等可知。刘肃生逢唐宪宗之世。唐宪宗有中兴之志,很注意本朝的历史经验教训,“嗣位之初,读列圣实录,见贞观、开元故事,竦慕不能释卷,顾谓丞相曰:‘太宗之创业如此,玄宗之致理如此,既览国史,乃知万倍不如先圣。’”(《旧唐书·宪宗本纪·史臣论》)刘肃自序题登仕郎前守江州浔阳县主簿,虽然地位低微,并不影响他的史学追求。关于《大唐新语》的材料来源,陈寅恪先生指出“大都出自国史”^③。当然为了更全面地提供鉴戒,《大唐新语》在国史之外也参考了一些杂史、笔记,其中对刘餗《隋唐嘉话》、韩琬《御史台记》采用颇多,这加以对勘不难发现。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将《大唐新语》列入杂史类,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亦入杂史类,可见宋人对此书性质的认识基本一致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曰:“皆取轶文旧事有裨劝戒者。……然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,未免自秽其书,有乖史家之体例。今退置小说家类,庶协其实。”四库馆臣仅据谐谑一门而将此书从杂史类贬入小说家类,其理由并不充足。检此门十四条,大多实寓庄于谐,兹举一例:“则天初革命,恐群心未附,乃令人自举。供奉官正员之外,置里行、拾遗、补阙、御史等,至有车载斗量之咏。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,值里行数人聚立门内,令史下驴,驱入其间。里行大怒,将加杖罚,令史曰:‘今日过实在驴,乞数之,然后受罚。’里行许之,乃数驴曰:‘汝技艺可知,精神极钝,何物驴畜,敢于御史里行?’”

诸里行羞赧而止。”这段记事讽刺武后朝滥授官职的现象,实依据《隋唐嘉话》卷下,文中“车载斗量之咏”,可参考《朝野僉载》卷四的一段记载:“则天革命,举人不试皆与官,起家至御史、评事、拾遗、补阙者,不可胜数。张鹭为谣曰:补阙连车载,拾遗平斗量。杷推侍御史,碗脱校书郎。”这类嘲讽文字初看不够庄重,实际上是从反面或侧面提供教训,并不偏离有裨鉴戒的主旨。

《谭宾录》已佚,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小说家类著录十卷,云胡璩“字子温,文、武时人。”《太平广记》存佚文约一百二十条,绝大多数记载唐代人物事迹。《类说》与《绀珠集》亦各存数条。贾宪保撰《从〈旧唐书〉、〈谭宾录〉中考索唐国史》一文^④,据其对勘考察,《太平广记》有《谭宾录》佚文一百二十一条,其中有三十七条不见于《旧唐书》,而见于《旧唐书》的八十四条中,有七十八条记载与《旧唐书》相同,只有六条稍有不同。与《旧唐书》记载相同者,常常是《谭宾录》简略,《旧唐书》详尽,故不可能是《旧唐书》抄录《谭宾录》。二书内容相同者实皆源出唐国史。这方面有最有力的两个证据:一是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七六《郭子仪》条与《旧唐书·郭子仪传》内容相同的部分,自“事上诚荅,临下宽厚”以下一段文字,《旧唐书》以“史臣裴垍曰”五字领起。二是《太平广记》卷一九〇《马燧》条与《旧唐书·马燧传》内容相同的部分,自“燧勇力智强,常先计后战”以下一段文字,《旧唐书》以“史臣曰”三字领起。这就可以证明《旧唐书》这两处是直接抄录了唐国史中的史官议论,而《谭宾录》这两条与《旧唐书》同出一源,也抄自唐国史。此外,根据《谭宾录》中所保存的德宗朝其他一些人物事迹,也能发现纪传体唐国史至少修至德宗贞元末期。

从《太平广记》引文来看,《谭宾录》大部分取材于唐国史,同时也采用了其他一些书籍,如《隋唐嘉话》。王国良说:“其《尉迟敬德》、《秦叔宝》、《天后》数条,见刘餗《隋唐嘉话》。”^⑤关于《谭宾录》的著书宗旨,因为没有相关文字流传,已不能像《大唐新语》那样确切判定。据书名“谭宾”之意推测,当是记载这些内容以作宾客谈

助,从而满足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兴趣。这正是唐代杂史、笔记得以盛行的基本条件之一。

二、对唐代笔记与《旧唐书》相同记载的甄别

唐代有些笔记的一部分材料取自国史,例如张鹭《朝野僉载》。此书作于玄宗开元中期。张鹭其人在当时以文才著称,生平附见《旧唐书》与《新唐书》其孙《张荐传》。张鹭又写过传奇体的《游仙窟》,从中可见其人风流不羁。与成书时间相近的《隋唐嘉话》记人记事多正面之词不同,《朝野僉载》多揭露讥刺武后时朝政与大小官吏,这正反映其个人品性,主要原因或许是恃才自傲,而其书之作未必没有补史之意。洪迈《容斋续笔》卷十二评此书曰:“记事皆琐尾擿裂,且多嫫语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赞同洪迈的评价,也说:“于诸噓荒怪,纤悉胪载,未免失于纤碎。”然书名“朝野”之“野”,正说明其对下层社会情况的重视与广泛搜集记载,从史料价值来说很珍贵。书中对朝廷之事的记载也多有可取,故《新唐书》与《资治通鉴》皆曾充分利用此书。马雪芹撰《评〈朝野僉载〉》一文^⑥,对《朝野僉载》与两《唐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记载相同的情况作了考察。这里要注意的是《朝野僉载》与《旧唐书》相同的情况。据马氏统计,今中华书局校点本《朝野僉载》正文六卷计三百七十条,补辑计九十四条,共四百六十四条,其中记载与《旧唐书》相同者共四十六条。马氏认为,二者的来源都应唐国史、实录旧文。其结论从原则上来说是正确的。但是,笔者将《朝野僉载》与《旧唐书》中同记一事而文字也相同相近的地方加以对照考察后,认为二者同源唐国史、实录者并不多,反而是《旧唐书》采用《朝野僉载》者较多。

在《旧唐书》中,《五行志》与《朝野僉载》记载相同的地方很多,有二十多处,适合用来辨别二者各自的材料来源。正史中的《五行志》记载灾异征应等,在唐代,其材料来源主要根据中央各机构及州县报送史馆的相关文字。《唐会要》卷六十三《史馆上·诸司应送

史馆事例》规定自祥瑞、天文祥异直到诸王来朝的一应事例,“所由有即勘报史馆,修入国史”。在“有年及饥,并水、旱、虫、霜、风、雹,及地震、流水泛滥”这一类事例之下注曰:“户部及州县每有即勘其年月日,及赈贷存恤同报。”《唐会要》卷四十二《地震》,卷四十三《山摧石陨》、《水灾上》,卷四十四《水灾下》、《火》、《木冰》、《螟蜥》、《杂灾变》等类应当就是根据历年报送至史馆的文字乃至已编入纪传体国史《五行志》中的文字而成。对于灾变的记载,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与《唐会要》大体相同,所记事件互有增减,而《旧志》总体上多于《唐会要》。由此可以判断《旧志》的主要史源与《唐会要》相同,即出自唐史馆档案材料及唐国史旧文,而《唐会要》采取相对较少。

《朝野僉载》与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记载相同的地方有史源同出史馆档案材料或实录、国史者,对勘易知。这里要强调的是,也有《旧志》采用《僉载》的情况,并且更多一些。为便于读者了解,兹将二者记载相同处条列如下(二者皆标明中华书局点校本页码):

1、《旧唐书》1350页“永昌中华州敷水店西南坡白昼飞四五里”条与《僉载》119页“永昌年太州敷水店西南坡白日飞四五里”条。

2、《旧唐书》1357页“(开元)八年夏契丹寇营州”条与《僉载》21页“开元八年契丹叛”条。

3、《旧唐书》1363页“长安四年九月后霖雨并雪”条与《僉载》20页“长安四年十月阴雨雪”条。

4、《旧唐书》1366页“景龙中东都凌空观灾”条与《僉载》8页“景龙四年洛州凌空观失火”条。

5、《旧唐书》1366页“开元五年洪潭二州灾”条与《僉载》21页“开元五年洪潭二州复有火灾”条。

6、《旧唐书》1366页“(开元)十五年衡州灾”条与《僉载》177页“唐开元二年衡州五月频有火灾”条。

7、《旧唐书》1368页“高宗文明后天下频奏雌雉化为雄”条与《僉载》99页“文明以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多”条。

8、《旧唐书》1369页“永徽中黑齿常之戍河源军”条与《金载》145页“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”条。

9、《旧唐书》1369页“先天初洛阳市人牵一羊”条与《金载》120页“先天年洛下人牵一牛奔”条。

10、《旧唐书》1369页“(开元)三年有熊白昼入广陵城”条与《金载》147页“开元三年有熊白日入广府城内”条。

11、《旧唐书》1371页“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下有白蛇长六七尺”条与《金载》122页“开元四年六月郴州马岭山侧有白蛇长六七尺”条。

12、《旧唐书》1374页“玄宗初即位,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”条与《金载》13页“神武皇帝七月即位,东都白马寺铁像头无故自落于殿门外”条。

13、《旧唐书》1375页“隋文时自长安故城东南移于唐兴村置新都”条与《金载》8页“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”条。

14、《旧唐书》1376页“调露中高宗欲封嵩山”条与《金载》9页“调露中大帝欲封中岳”条。

15、《旧唐书》1376页“永徽末里歌有《桑条韦也乐》、《女时韦也乐》”条与《金载》9页“永徽年以后人唱《桑条歌》”条。

16、《旧唐书》1376页“龙朔中俗中饮酒令”条与《金载》13页“龙朔年已来百姓饮酒作令”条。

17、“时里歌有《突厥盐》”条与《金载》8页“龙朔以来人唱歌名《突厥盐》”条。

18、《旧唐书》1376页“如意初里歌云”条与《金载》9页“周如意年中以来始唱《黄麋歌》”条。

19、《旧唐书》1376页“垂拱已后东都有《契苾儿歌》皆淫艳之词”条与《金载》9页“周垂拱已来《苾拏儿歌》皆是邪曲”条。

20、《旧唐书》1376页“上元中为服令九品已上佩刀砺等袋”条与《金载》68页“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配刀砺等袋”条。

21、《旧唐书》1377页“张易之为母阿臧为七宝帐”条与《金载》69页“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”条。

22、《旧唐书》1377页“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”条与《金载》71页“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”条。

23、《旧唐书》1377页“韦庶人妹七姨嫁将军冯太和”条与《金载》117页“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”条。

经对勘，上列第1、5、8、10、13、14、16、17、18、21条可判断为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采用《朝野金载》，盖大抵《金载》文字稍详。第3、9、12条《金载》所记当为其亲身所见，似与史馆材料无关。其余各条亦有一些难以断定《旧志》与《金载》是否同源于国史等史馆材料，如第11、15、23条。因此，《金载》与《旧志》同源于国史等史馆材料者确实不多。以下举《旧志》采用《金载》者数例。

上列第1条，《金载》曰：

永昌年，太州敷水店西南坡白日飞四五里，直塞赤水。坡上桑畦麦陇依然仍旧。

《旧志》曰：

永昌中，华州敷水店西南坡白昼飞四五里，直抵赤水。其坡上树木禾黍宛然无损。

二者记载相同。华州即太州。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，华州，“垂拱元年改为太州，避武太后祖讳也。神龙元年复旧。”可知《金载》使用了事件发生当时的地名，《旧志》则改用后来的名称。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亦记载此事：“永昌中，华州赤水南岸大山，昼日忽风昏，有声隐隐如雷，顷之渐移东数百步，拥赤水，压张村民三十余家。山高二百余丈，水深三十丈，坡上草木宛然。”这显然是一次山体移动，《金载》与《旧志》记作“飞四五里”，《新唐书》记作“渐移东数百步”，相比较，《金载》与《旧志》所记简略，夸张成分较重，《新唐书》所记则详实可信，应是根据唐代史馆旧文而成。因此可以判断，《旧志》此处并未采用史馆旧文，而是采用了《金载》。

上列第5条,《金载》曰:

开元五年,洪、潭二州复有火灾。昼日人见火精赤燉燉,所诣即火起。

《旧志》曰:

开元五年,洪、潭二州灾,火延烧郡舍。郡人先见火精赤燉燉飞来,旋即火发。

此处记载中“赤燉燉”或“赤燉燉”之语言独特,具文学修饰性,经检索,二十四史中仅《旧唐书》此例,然则其不属史家语言无疑,张鷟用之则合宜。故此处当属《旧志》采用《金载》。

上列第8条,《金载》曰:

将军黑齿常之镇河源军,城极严峻。有三口狼入营,绕官舍,不知从何而至,军士射杀。黑齿忌之,移之外。奏讨三曲党项,奉敕许,遂差将军李谨行充替。谨行到军,旬日病卒。

《旧志》曰:

永徽中,黑齿常之戍河源军。有狼三头,白昼入军门,射之毙。常之惧,求代。将军李谨代常之军,月余卒。

比勘二文,《金载》文字详细。《金载》未具时间,《旧志》云“永徽中”;《金载》“李谨行”,《旧志》作“李谨”。黑齿常之,两《唐书》有传。其人原为百济将领,高宗龙朔三年(663)降唐。仪凤三年(678)为河源军副使,进大使,在军七年。李谨行,《新唐书》有传,云其为积石道经略大使。上元三年(676),破吐蕃于青海。《旧志》此条应是节取《金载》之文,抄录时脱去李谨行之“行”字,又在开端加上“永徽中”三字以求符合记灾变详具发生时间的体例。按永徽(650—655)时,黑齿常之尚未降唐,故《旧志》云“永徽中”显系后人妄言,可见此条绝非沿用国史旧文。此后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记作:“永徽中,河源军有狼三,昼入军门,射之毙。”又应是据《旧志》删节而成,沿袭“永徽中”之误。

上列第10条,《金载》曰:

开元三年,有熊昼日入广府城内,经都督门前过,军人逐十

余里，射杀之。后月余，都督李处鉴死。自后长史朱思贤被告反，禁身半年，才出即卒。司马宋草宾、长史窦崇嘉相继而卒。

《旧志》曰：

（开元）三年，有熊白昼入广陵城，月余，都督李处鉴卒。此条焦点在“广府城”与“广陵城”孰是孰非，前者指广州城，后者指扬州城。唐代于要地设置都督府，广州、扬州在其中，扬州且长期为大都督府，可分别简称为广府、扬府。据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四下，大都督府，亲王遥领大都督，长史主大都督府之政。此处若指开元时扬州，则府中不应有都督，《金载》所记府中有都督，则显非扬州，“广府城”不误，《旧志》作“广陵城”误。《唐刺史考全编》即据《金载》此条列李处鉴为广州都督，并指明《旧志》“误作‘入广陵城’”。此条显系《旧志》采用《金载》而有误。此后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记作：“开元三年，有熊昼入扬州城。”“扬州城”沿袭《旧志》“广陵城”之误。

上列第13条，《金载》曰：

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，隋曰唐兴村门首。文皇帝移长安城，将作大匠高颀常坐此树下检校。后栽树行不正，欲去之，帝曰：“高颀坐此树下，不须杀之。”至今先天百三十年，其树尚在，柯叶森疏，株根盘礴，与诸树不同。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首，今唐家居焉。

《旧志》曰：

隋文时，自长安故城东南移于唐兴村置新都，今西内承天门正当唐兴村门。今有大槐树，柯枝森郁，即村门树也。有司以行列不正，将去之，文帝曰：“高祖尝坐此树下，不可去也。”隋文帝令高颀等营建长安新都，事在开皇二年，《隋书·高颀传》曰：“领新都大监，制度多出于颀。颀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。其树不依行列，有司将伐之。上特命勿去，以示后人。其见重如此。”由此可见张鷟对高颀此事应早有所知，又于一百三十年后的先天年间亲见此大槐树，写成此条记叙小品，而绝不是抄自史馆材料。《旧

志》当据《金载》删改而成,然而改动草率,次序不清,以致将高颀误作高祖^⑦。这可能不是《旧唐书》流传中的刻写错误。唐初史臣似不会将高颀此事当作国史材料,五代修《旧唐书》史臣应是见到《金载》此文而产生误解,写入《五行志》。
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中“诗妖”、“服妖”类的条文,几乎都与《朝野金载》中的记载相符。《旧志》“诗妖”类共九条,有七条亦见于《金载》(即上列第13—19条),其中五条(即第13、14、16、17、18条)可判断为《旧志》采用《金载》。此外,《金载》另有数条歌谣不见于《旧志》,后为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“诗妖”类所采用。《旧志》“服妖”类共四条,事皆涉及中宗朝,亦皆见于《金载》(即上列第20—23条),其中张易之条与安乐公主条(即上列第21、22条)两条差异较大。张易之条,《金载》详于《旧志》;安乐公主条,则《旧志》详于《金载》。由此看来,《旧唐书》史臣在编撰《五行志》中“诗妖”、“服妖”类时可能没有现成的史馆材料可供利用,而主要依据了《朝野金载》,仅略微参考了其他一些材料,否则很难解释其对中宗朝以后之事几乎没有记载的现象。此处或许可以作出一种推测,即《金载》这些内容本来自史馆材料,《旧志》亦得以利用史馆材料而稍加删节,故《金载》稍详而《旧志》稍略。但是这种推测很难成立,因为这类材料零散琐碎,基本上不在“诸司应送史馆事例”范围之内,何况时间又集中于张鷟本人所经历的高宗、武后、中宗朝,应是其亲自见闻与搜集而得。

总之,《朝野金载》与《旧唐书》记载相同的部分应当有两种情况,一是《金载》采取了国史等材料,这与《旧唐书》史源相同,一是《金载》被《旧唐书》直接采用。

由此可以想到,在考察成书早于《旧唐书》之前的杂史、笔记与《旧唐书》二者相同记载的关系时,既要注意有《大唐新语》、《谭宾录》那样大量内容与《旧唐书》同源出于唐国史的著作,也要注意有《朝野金载》这样其中一些记载被《旧唐书》直接采用的著作,不可

一概认为凡二者记载相同即是笔记采用国史。这里需要实事求是的态度、具体分析的方法,这也是本节占用较大篇幅之用意所在。

进而言之,也有被唐国史采用的杂史、笔记,明显的例证是韩琬《御史台记》。韩琬《御史台记》已佚,《太平广记》存佚文五十七条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等书目将其列入职官类,据记载,韩琬官殿中侍御史,其书十二卷,记唐初至开元五年御史台制度与人物事迹。日本学者池田温撰《论韩琬〈御史台记〉》^⑧,文中曾将《旧唐书·酷吏传》与《御史台记》对照,论证《旧唐书》所记武后朝御史台官员的事迹有许多依据了《御史台记》,说明唐国史依据了《御史台记》。

三、唐代笔记对源于国史之传闻的利用

宗旨在补史之阙的笔记不会直接抄录国史,但有时也有与国史相同的内容。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之子刘餗亦曾任史官,所撰《隋唐嘉话》是唐代较早产生的笔记。此书多异称,北宋后期方有《隋唐嘉话》之名,原名当作《传记》或《国朝传记》,或《国史异纂》^⑨。从其原名来看,刘餗是要让这书的性质接近历史著述。书前自序曰:“余自髫髻之年,便多闻往说,不足备之大典,故系之小说之末。”中唐时李肇《国史补》序曰:“昔刘餗集小说,涉南北朝至开元,著为《传记》。予自开元至长庆撰《国史补》,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,续《传记》而有所不为。”由此可见刘餗此书补史之阙的宗旨及其重大影响。据其自序所云“多闻往说”,则其书不会直接引录国史,然其所闻实有与国史相同者。见下例:

《隋唐嘉话》卷上:

太宗之为秦王,府僚多被迁夺,深患之。梁公曰:“余人不足惜,杜如晦聪明识达,王佐才也。”帝大惊,由是亲宠日笃。杜仆射薨后,太宗食瓜美,怆然思之,遂辍其半,使置之于灵座。

《旧唐书·杜如晦传》:

太宗平京城,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,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。时府中多英俊,被外迁者众,太宗患之。记室房玄龄曰:“府僚去者虽多,盖不足惜。杜如晦聪明识达,王佐才也。若大王守藩端拱,无所用之;必欲经营四方,非此人莫可。”太宗大惊曰:“尔不言,几失此人矣。”遂奏为府属。……太宗后因食瓜而美,怆然悼之,遂辍食之半,遣使奠于灵座。

这两段记载内容相同,《隋唐嘉话》文字稍简略,可见其说亦当源出国史,刘餗据所闻而录。

《隋唐嘉话》卷中记载了虞世南的一些事迹,大多见于《旧唐书·虞世南传》,其中有一条曰:“太宗称虞监,博闻、德行、书翰、词藻、忠直,一人而已,兼是五善。”《旧唐书》作:太宗“尝称世南有五绝:一曰德行,二曰忠直,三曰博学,四曰文辞,五曰书翰。”这“五善”与“五绝”的顺序有所不同,应是在对国史的传述过程中产生了细微变化。

不著撰人的《大唐传载》作于文宗大和八年^⑨,记唐初至大和时人物事迹及朝章制度等,自序云“传其所闻而载之”,然其中也能发现与《旧唐书》相同的内容。《大唐传载》曰:

唐皎贞观中为吏部。先时选集,四时随到即补。皎始请以冬时大集,终季春而毕。至今行之。

《旧唐书·唐临传附唐皎传》曰:

贞观中,累转吏部侍郎。先是,选集无限,随到补职。时渐太平,选人稍众,皎始请以冬初一时大集,终季春而毕。至今行之。《旧唐书》文字比《大唐传载》详细,不会是采用《大唐传载》,而《大唐传载》写作时间距贞观已约有二百年,也不可能仅据口头传闻而与《旧唐书》文字如此相近。因此可以判断,二者应是同出一源,即同出国史。好在《唐会要》中有确凿证据,卷七十五《选部下·选限》有一条小注:

按工部侍郎韦述《唐书》云:“贞观八年,唐皎为吏部侍郎,

以选集无限,随到补职,时渐太平,选人稍众。请以冬初一时大集,终季春而毕。至今行用之。”诸史又云是马周。未知孰是,两存焉。

可以看出,《旧唐书》此处沿用了韦述《唐书》。韦述于玄宗朝任史官,撰《唐书》一百一十三卷,是继令狐德棻至吴兢之后修订而成的一部国史,安史之乱中,韦述保存下这部国史。^⑨由于国史在社会上的流传,《大唐传载》作者得以据其所闻而记载唐皎此事。

《大唐传载》有两条文字被谢保成《〈旧唐书〉的史料来源》一文引用来与《旧唐书》对照^⑩,以说明《旧唐书》曾取材于《大唐传载》等笔记类著作。然而这两例可商榷。其一关于唐临:

唐公临性宽仁,多慈恕。欲吊丧,令家僮归取白衫,僮仆误持余衣,惧未敢进。临祭,公谓之曰:“今日气逆,不宜哀泣,向取白衫且止之。”又令煮药,不精,潜觉其故,又谓曰:“今日阴晦,不宜服药,可弃之。”终不扬其过也。

《旧唐书·唐临传》记载此事,文字大同小异。唐临为唐皎之弟,然则《大唐传载》与《旧唐书》此处亦当同源为国史,《大唐传载》作者亦据所闻之国史而记载。

其二是“韩太保皋生知音律”一条,文长不录。据《旧唐书·韩皋传》,韩皋卒于穆宗长庆二年,赠太子太保。当《大唐传载》成书之时,穆宗朝实录尚未纂修,故此条不可能出于实录。如果说是取材于国史中列传所依据的行状之类文字,行状似乎也不可能收入这样的大段议论。因此,《大唐传载》此条当另有来源,与国史无关。据此似乎可以作出判断,《旧唐书》此处极有可能直接采用了《大唐传载》。如果没有别的文献资料,对这一条的讨论只能到此为止,但是《太平广记》卷二〇三所引《卢氏杂说》也有相同的文字,比《大唐传载》详细,再与《旧唐书》对照,可以发现《旧唐书》实际上与《卢氏杂说》相同,亦即《旧唐书》直接采用了《卢氏杂说》。《卢氏杂说》成书后于《大唐传载》,对韩皋知音律的记载应是同出一源,然而其源已

不可探寻。虽然如此，此例仍能够证明《旧唐书》采用了笔记类著作的材料。如同上文考察《朝野僉载》时所说，在强调唐代笔记利用国史的同时，也要注意《旧唐书》及唐国史对笔记的利用。

记录传闻的笔记，其中有源出国史的材料，这方面还有别的情况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言及《大唐传载》与他书记载不合时说：“盖当时流传互异，作者各承所闻而录之，故不免抵牾也。”这里要讨论的是“作者各承所闻而录之”而记载相同的情况。有多种笔记记一事相同，又皆与《旧唐书》相同，后出之笔记未必袭用前人之笔记，其来源皆应间接出于国史或国史采用的原始材料，其事当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，笔记作者各就其所闻而记载之。下举一例。

《国史补》上“卢杞为奸邪”条曰：

德宗既贬卢杞，然常思之。后欲稍迁，朝臣恐惧，皆有谏疏。上问李泌公曰：“卢杞何处奸邪？”勉曰：“天下以为奸邪，而陛下不知，所以为奸邪也。”

《大唐传载》曰：

德宗问李泌公勉：“人云卢杞是奸邪，何也？”勉曰：“人皆知之，陛下独不知，此所以为奸邪也。”

《旧唐书》也有相同的两处记载。《李勉传》云：

上谓勉曰：“众人皆言卢杞奸邪，朕何不知？卿知其状乎？”

对曰：“天下皆知其奸邪，独陛下不知，所以为奸邪也。”

《卢杞传》记载朝臣进谏尤详，亦云：

上曰：“众人论杞奸邪，朕何不知？”勉曰：“卢杞奸邪，天下人皆知，唯陛下不知，此所以为奸邪也。”

考察《谭宾录》可以得知，纪传体国史至少修至德宗末期，则《旧唐书》李勉与卢杞二传皆应源于国史，《国史补》与《大唐传载》二者记载皆与《旧唐书》相同，亦应源于国史。然《国史补》意在补史之阙，《大唐传载》“传其所闻而载之”，都不大会直接抄录国史原文，则二书作者所闻实间接出自国史，与《旧唐书》不同处仅在于对李勉加

以尊称,而这是笔记与国史著作体例的语气区别。这两种笔记之间文字稍异,则可能是传闻渠道不同。

当今讨论唐代笔记与国史的关系,由于唐国史已不存在,《旧唐书》、《唐会要》是必须参照也是能触发新见的可靠史料。本文的论述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,一是《旧唐书》前半时期主要依据国史原文,二是唐国史曾在社会上流传。由前一点,我们可以通过《旧唐书》了解唐国史。由后一点,我们确信唐代笔记能够利用国史。其利用方式或直接抄录国史,或根据所闻知的国史内容而间接利用。论证时,主要取《旧唐书》与唐代笔记的相同记载加以对照考辨,在审慎地得出唐代笔记利用国史这一结论的同时,也注意到唐国史及《旧唐书》利用笔记的相对次要的一面。

注:

①文载《唐人笔记小说考索》,《周勋初文集》第5卷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0年9月。

②参看赵翼:《陔余丛考》卷十《〈旧唐书〉多国史原文》条、《廿二史札记》卷十六《〈旧唐书〉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》条。

③见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第五章《新乐府·七德舞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8年3月。

④⑥文载《古代文献研究集林》第一集,陕西师大出版社,1989年5月。

⑤见王国良:《唐代小说叙录》,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9年11月出版。

⑦中华书局本《旧唐书·五行志》校勘记:“叶校本‘高祖’作‘高颀’。”

⑧文载《唐研究论文选集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9年12月。

⑨参看周勋初师《〈隋唐嘉话〉考》,文载《唐人笔记小说考索》。

⑩参看笔者《〈大唐传载〉考》,文载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》,1990年第5期。

⑪见《旧唐书·韦述传》。

⑫文载《唐研究》第一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5年12月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